

海豚文库·文艺复兴系列:: :: :: :: 丛书主编 朱孝远

Secretum

秘 密



[意大利] 彼特拉克 著 方匡国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546.6/3


2008

海豚文库·文艺复兴系列  
丛书主编 朱孝远

# 秘 密

Secretum

[意大利] 彼特拉克 著 方匡国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秘密 / (意)彼特拉克; 方匡国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4

(海豚文库. 文艺复兴系列 / 朱孝远主编)

ISBN 978-7-5633-6863-1

I. 秘… II. ①彼…②方… III. 散文—作品集—意大利—中世纪 IV. I54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860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  
(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889 mm × 1 194 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85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5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导 言

**彼**特拉克(Francis Petrarck, 1304—1374)是近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古典作家和人文主义者。他复杂的个人特质、鲜活的公共意识,他对诗与文学的思想追求和坚定信念,以及他面对古典作家的积极态度等等,都清楚地揭示了一个崭新文明的诞生,一种新的美学理念的形成。在欧洲人文学和美学史上最具决定性的转变时刻,彼特拉克耗其一生,为古代思想的延续和再创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往后的世纪里,他的行为典范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敏锐而强烈的西方文化思想家和政治实践家。因此,过去七百年来,人们不断为彼特拉克加冕了各种荣誉和称号:在他生前,由于创作了杰出的拉丁作品《阿非利加》,罗马参议院授予他诗人最高荣誉的象征——“桂冠”(laurel);在他死后的一百年里,他迅速成为意大利、英国乃至法国人文主义者崇拜的偶像,是众所周知的“人文主义之父”;到了19世纪,他被

工业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拔高至全新的地位——他们称他为“第一位现代人”(First Modern Man),意即西方历史上第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sup>①</sup>;而现在,大部分的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则认为他是“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的先驱人物,他不仅激励后代无数文人共同致力于建构理想的“人间共和国”

---

<sup>①</sup> 传统上认为,这种说法最早可追溯到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以及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前者在演说中经常使用“第一位现代人”(le premier homme moderne)来称呼彼特拉克;后者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第二、第三篇里将彼特拉克同但丁、薄伽丘等人一起置于近代古典文化复兴的最高峰,并认为他们共同代表了近代个人发展的典范,参见该书 98—184 页(*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trans. S. G. C. Middlemor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Earthly Republic*)<sup>①</sup>，而且使政治理念、社会现状和人文学思想在知识分子的生活融为—体，成为此后每一个西方知识分子书房里的永不散去的精神气质。虽然彼特拉克留下的庞大遗产至今仍未被完全消化，但不可否认，通过精确地解读他最重要的作品《秘密》(*Secretum*)及其写作背景，我们将可更为全面地理解彼特拉克自身非凡的命运，以及他在历史上所占有的独特地位。

## 一、彼特拉克的生平

彼特拉克在 1304 年出生于意大利中部托斯卡尼地区的

---

① 关于其政治思想的研究是彼特拉克研究领域最近五十年来重大成就。文艺复兴史家汉斯·巴伦(Hans Baron)的《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转折》(*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 Civic Humanism and Republican Liberty in an Age of Classicism and Tyrann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5)以及《彼特拉克的秘密：它的创作及其意义》(*Petrarch's Secretum: Its Making and Its Meaning*. Cambridge, 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是其中的标杆之作。然而，彼特拉克虽被大多数学者视为“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的先驱人物，但巴伦认为，彼特拉克在中年之后，其早期共和主义理念逐渐让位给了王权主义。而这种朝向王权政治的发展趋势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同时这也足以使彼特拉克与他之后两代激进的佛罗伦萨公民人文主义者分道扬镳。从这种大的历史背景出发，巴伦得出的结论是：真实的彼特拉克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保守，并更接近于中世纪的文人——引用原话来说，他既非“中世纪”、也非“文艺复兴”的典型人物，而更像是(若我能使用这个角色做比的话)一位摩西；他虽然率先看到了新大陆，但尚未被许诺进入它。参见汉斯·巴伦《文艺复兴解释中的疑难：对华莱士·弗格森的回答》(Hans Baron, "Moot Problems of Renaissance Interpretation: An Answer to Wallace K. Ferguso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 1958, p. 28)。

阿雷佐(Arezzo)<sup>①</sup>。身为遭到政治流放的佛罗伦萨公证人的长子,彼特拉克的幼年是在法国南部的阿维农度过的<sup>②</sup>。他的父亲特别重视法律教育,因此在他20岁之前,彼特拉克及其胞弟格拉多(Gherardo Petrarch)先后于蒙彼利埃和波隆那学习法学。然而,法学的枯燥让年轻的彼特拉克无法接受,于是,他父亲过世后,他很快地放弃了仕宦之途,转而学习古典文学和哲学,并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捩点。1327年4月6日,未满23岁的彼特拉克在阿维农的桑塔奇亚拉教堂遇见了少妇劳拉(Laura)——一位他终其一生都无法忘怀、身份不详的女子——并为她陆续创作出大量的爱情十四行诗。虽然按照彼特拉克自己的说法,劳拉立即回绝了他当时的热烈追求;但日后这部多达366首、耗时近20年编写而成的《歌集》(*Canzoniere*),在近代意大利乃至欧洲全境内刮起了一股旋风,几乎所有的读者都为彼特拉克的种种情思——忧郁、宁静、苦闷、激情——所虏获,这些带有橄榄般香味的意大利诗

---

① 关于彼特拉克的生平研究,至今最翔实的是威尔金斯(Ernest Hatch Wilkins, 1880—1966)的《彼特拉克传》(*Life of Petrarc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本书的相关考证资料以此书为准,另参照《秘密》卡罗萨和谢伊的英译本(Davy A. Carozza and H. James Shey, *Petrarch's Secretum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Critical Anthology*. New York: Peter Lang, 1989)一书所附的年表。

② 1309年,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将教廷迁至阿维农,许多意大利文人和官僚也随之到来。因此,在往后的半个世纪里,此地社交和文化氛围活跃,近半个意大利城市。



歌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最流行的读本。正是这股惊人的力量将桂冠戴在了彼特拉克的头上，劳拉之爱从此牢牢占据着彼特拉克不朽神话的核心位置。

然而，彼特拉克的另一种转变也在此时开始酝酿：与劳拉相遇之时，他正沉溺于拉丁古典作家和中世纪教父们的伟大作品之中。这种阅读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他对世俗之爱的追求。罗马诗人维吉尔和奥维德、历史学家李维和苏维托尼乌斯、哲学家西塞罗和塞涅卡，以及最重要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等人，他们逐渐成了彼特拉克心中两种强而有力的精神指导。一方面，他开始对所在的教廷环境的纷扰感到厌恶，崇尚孤独隐逸的生活，以从事诗歌和历史散文的创作为志；另一方面，他试图同那些哲学家前辈一样，成为一位有政治抱负的博学之士，一位真正的“文人”(man of letters)，矢为公众事务立其功业。在往后的十年里，彼特拉克似乎完成了他所追求的这两项远大目标。1330年前后，他在教会的主持下秘密地削发并发独身誓<sup>①</sup>，成为一名低阶教士；接着，因为与修会和教廷关系密切，30岁时他被任命为教皇本尼迪克十二世的教团成员，同各国政治官员展开密集的书信往来。这项工作维持了七年，这是他人生进入盛年之前的一段耕耘期，为他积累了相当分量的社会经历；但彼特拉克在完成社交使命及城市生活之

---

<sup>①</sup> 此事并没有为彼特拉克提及，但已有诸多文献支持这种观点。究其原因，疑与追求劳拉失败有关。参见威尔金斯《彼特拉克传》，9—10页。



外,仍时刻不忘他内心渴望隐居、埋首于古典智慧的情怀。

1336年4月26日,他与格拉多攀登上了法国南部的旺图山(Mount Ventoux),这件在当时人们看来不太寻常的事迹结果却成了彼特拉克另一项传奇:他很可能是西方近代首位将登山旅行完整记录下来,并以之作为个人精神发展象征的思想家<sup>①</sup>。便是在这一天,彼特拉克遭遇了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在细致地描述他们兄弟俩一齐迈向高峰的过程之际,彼特拉克以隐喻的笔法诉说了自己内心的精神转变——从感官的挣扎(高山望之生畏、举步维艰)一步步走向灵魂的升华(登高处,见得尘世之渺小)。整篇登山记的高潮出现在彼特拉克在高峰处向格拉多阅读奥古斯丁《忏悔录》的那一刻。读到这些文字,彼特拉克立即感到无比的震撼,意识到自己需要忏悔:

人们赞叹山岳的崇高,海水的汹涌,河流的浩荡,海岸的逶迤,星辰的运行,却把自身置于脑后。<sup>②</sup>

---

<sup>①</sup> 此事收录在彼特拉克《通信集》第四卷第一封信里,即著名的《旺图山攀登记》(*The Allegorical Ascent of Mount Ventoux*)。全文内容可参见尼可斯的《秘密》最新英译本(F. G. Nichols, *My Secret Book*. London: Hesperus Press, 2002, pp. 104-111)。

<sup>②</sup> 中译文参见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卷第八章,100页,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在那一刻,对自然、知识的追求以及人的自我救赎融合到一起,彼特拉克似乎以个人觉悟向我们展示,只要发现世界便能发现自我。他的这种“现代”意识(撇开彼特拉克是否真具有这种意识不谈)——将“个人致知”(personal knowledge)放在首位的信念——已远远地超越了他的前辈及同时代人,这种思想的力量对其后欧洲知识界的影响是极大的。而对他自身而言,如果说劳拉之爱是阻碍他灵魂升华的甜蜜羁绊,那么奥古斯丁的出现则无疑是劈开这沉重枷锁的必要利器,是将他从凡俗尘世拉回永恒秩序的救星。经过此次非凡的体验,彼特拉克于是毅然地开始他的学者生涯。

从1337年退隐回阿维农起,彼特拉克在沃克吕兹(Vaucluse)的乡间生活成了他其后生活的重心。在那儿,而立之年的他决定着手两项计划。一是收集、整理遗散的拉丁古籍手稿,并编校他喜爱的古典作家们的著作;二是撰写一部关于古罗马将军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的长篇拉丁史诗《阿非利加》(*Africa*)以及一系列关于古罗马伟大领袖的传记集《名人传》(*De viris illustribus*)。尽管在这段安稳的写作时期彼特拉克实现了他先前所企盼的生活,但对世俗名利难以割舍的留恋却始终困扰着他的心境。1340年9月,仍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的彼特拉克,同时收到了来自巴黎大学和罗马参议院的桂冠加冕荣誉通知<sup>①</sup>。在名义上,授予他桂冠的理由乃是为了

<sup>①</sup> 彼特拉克立即选择了后者,并受邀赴那不勒斯王国接受考察。

表彰他在《阿非利加》(未完成作品)的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但实际上,更广为人知的真正理由乃是在于他为劳拉所创作的那些爱情诗歌,它们流行各地所带来的影响远比那些他本人引以为傲的拉丁作品要大得多。1341年4月8日,在盛大的加冕仪式上,彼特拉克到达了个人生涯的顶点,成为前所未有的“桂冠诗人”<sup>①</sup>。然而,这也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分水岭;彼特拉克从此闻名全欧洲,但他原本向往的田园之乐却也注定将为颠沛喧嚣的城市生活所取代。

在四十岁的头几年,重新涉足公众事务的彼特拉克变得比以往更加繁忙。除了完成教廷指派的外交任务之外,他对于古籍编撰和各类写作的兴趣丝毫未减(《歌集》第一版即于此时完成)。然而,这些工作和爱好却无助于他摆脱在宗教问题上遭受的信仰危机。这种危机并非完全出于内在的空虚;实际上,外在的一系列事件才是动摇其世俗价值观的主因。首先是其私生子女的相继出世。虽然彼特拉克本人极少提及他有未婚儿女的事实,但一般认为这对他自身的道德要求及世俗名誉打击甚大<sup>②</sup>。再者,其胞弟的入教则给予他更沉重的

---

<sup>①</sup> 当日于罗马卡匹托利(Campidoglio)山上,彼特拉克身着紫袍,在安茹王朝的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Robert of Anjou)的主持下,接受了罗马元老院授予他的桂冠。

<sup>②</sup> 此事与彼特拉克早年伴有独身誓约的教士身份相抵触,并寓示着一种对劳拉之爱的亵渎,这两点给他造成了更深的折磨。在日后完成的《秘密》的第二章里,彼特拉克便间接地提及自己犯有这种“肉欲之罪”。



一击。1343年，与彼特拉克感情至深的格拉多毅然加入法国加尔都西修会，在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他在世上最亲密的伴侣已然选择离他而去。最后，劳拉之死更是带来了极大的悲伤，她的逝去彻底终结了理想爱情在世上的唯一可能。如此一来，独自面对世俗世界的彼特拉克已不可能再同过去一样，永无休止地浸淫在那些完美的事物中，“个人救赎”遂成为彼特拉克中年最重要的关注点，而这尤其反映在他的代表作——《秘密》之中。

从1342至1343年起，彼特拉克便开始创作以“秘密”为题的三篇对话集，并在此后的十余年里反复改写其中部分内容。除了反映出上述关于宗教使命的心灵探索之外，这本小书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以层叠的形式及隐晦的内容，透露了彼特拉克看待自我的态度：一种以忏悔为其外衣的精神治疗。奥古斯丁的慈父形象与劳拉的情欲命题清楚地勾勒出他内心难以化解的矛盾，这种矛盾虽然在文末得到某种妥协式的和解，但任何一个读者都能看出这种和解背后隐藏的作者的固执：对彼特拉克而言，劳拉之爱的升华（象征世俗之爱的神圣化）在教父那儿虽然仍是不完美的道德缺陷，但却是他创作的源泉，是他无法割舍的情感。尽管世俗世界是如此肮脏污秽，但文中的弗朗西斯科显然尚未准备好迎接一个他必须弃绝一切自我价值的精神世界。

到了1352年，彼特拉克移居米兰，接受维斯康提家族的赞助和庇护。在那里，他开始写作占有重要地位的哲学作品

《论两种命运的补救方法》(*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 文中他论证并提出了几种应对个人好运和背运的方法。在意大利停留的这一时期,由于为共和君主赏识,彼特拉克逐渐在心境上回复到年轻时期的那种世俗古典主义,并且重新对过去的作品做了大量的增补及改写。这种依附君主的半独立生活(1356年依附于查理四世,1361年依附于维斯康提,1361年依附于威尼斯议会)一直持续到1374年他逝世于阿尔夸为止。在这些日子里,步入老年的彼特拉克成了各地文人探访的知名人士,包括薄伽丘在内,人们纷纷向他请益求稿。而白发苍苍的彼特拉克,直到死前仍伏案振笔,写作未完成的《名人传》。不论后人为他冠以怎样的称号,彼特拉克作为近代文人的典范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他一生坚持知识的“创作”与“传承”,并以身为位人文学者为荣;他复杂的精神世界同时向我们展现了知识分子内在的中古性与现代性;世俗之爱与古代思想虽均不被当时的宗教观念视作正途,但它们的力量在客观上却能将个体推向内在真实的自己。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彼特拉克不愧为西方思想界的巨人,他在七百年前便向世人证明了一个真理——知识分子若能孜孜不倦地耕耘智慧,那么他便能通往最终的精神救赎。

## 二、彼特拉克《秘密》及其研究

《秘密》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彼特拉克研究最重要的拉丁文本,它为洞察彼特拉克的精神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源。《秘密》不仅是一部自传性作品,藉由三篇虚构的道



德对话向我们揭示了彼特拉克早期的人文理想；更重要的，它同时也是一份人类自我治疗的伟大文本，展现出近代文人深邃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

在提供道德劝说上，彼特拉克在文中表明，凡人应为基督教义真理和古代哲人智慧所指引，以便从中探索自身对世界的“应为”态度，并尝试建立一些用以统领生命的正确原则。这种他极力强调的道德哲学主张，因人身处俗世，故万不能遗弃古代智慧与基督真理的双重指引之光。在宗教环境相当保守的14世纪，这种主张并不寻常，因为这似乎暗示着世俗责任可以成为个人得救的主要内容<sup>①</sup>。因此，《秘密》一书的宗教性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强烈，它更像是一种在世俗逸乐感悟与克己禁欲道路之间冲突对抗下的产物<sup>②</sup>。19世纪德国学者柯尔廷(Gustav Koerting)的经典看法是，《秘密》可被视作“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大宪章”，此乃鉴于它反映出了一种对世俗快乐和人间幸福的渴望；这种渴望旨在寻找属于自身的合理性，并与中世纪节制禁欲式的永恒幸福追求相对立<sup>③</sup>。《秘密》以诗人的良知阐明了这两种声音，它着重指出了

---

① 这似乎直到如今才在罗马天主教那里获得肯定。上个世纪60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之后，不仅“俗世不再为神圣障碍”已得到申明，就连平信徒的世俗责任亦被认可，成为个人得救的主要内容。

② 拉斐尔·阿马图罗：《彼特拉克》(Raffael Amaturò, *Petrarca*. Bari: Laterza, 1971), 120页。

③ 参见《秘密》卡罗萨和谢伊的英译本导言，4页。

早期人文主义者的信念：古典智慧的知识是个人道德形成的预备基础。因此，在《秘密》中，彼特拉克自己的化身——弗朗西斯科与古人的熟稔相交便充分比照出人类自身的脆弱和傲慢自负，从而为读者指出了精神觉悟之道。由此，彼特拉克超越时代之处在《秘密》里展现无遗，他在勾勒人类心灵的许多基本原则的同时，更反映出了不仅为诗人自己所独有的，而且也为后代人们所共有的本质——自我忧虑。

西方学者近年来开始逐渐意识到《秘密》传递出的更深的含义。许多研究者专门分析它的内容，不仅从中追踪彼特拉克个人的精神发展，同时也从所谓的“修正性意识形态观点”（revise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诗作主题”、“多种哲学的来源及影响者”，以及关于“沉思的理想源头”等多种面向来考察文本。<sup>①</sup>

因此，对彼特拉克精神形成（spiritual formation）的关注遂成为解读《秘密》一书的核心命题之一。意大利学者塞格雷（Carlo Segrè）和卡尔卡特拉（C. Calcaterra）两人很早便致力于发现《秘密》中圣书（sacred literature）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

---

<sup>①</sup> 这方面学术研究动态的参考论文见意大利学者塔特欧《彼特拉克，〈秘密〉一书中的内部对话和意识形态争辩》（Francesco Tateo, “Interior Dialogue and Ideological Polemic in Petrarch’s *Secretum*,” in *Petrarch’s Secretum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Critical Anthology*, pp. 251–272）。后面谈及的塞格雷、卡尔卡特拉、李维、海特曼、诺费利和卡斯蒂利等人所持之观点和看法，也引自此文。



奥古斯丁著作的功能。对塞格雷来说,奥古斯丁和彼特拉克分别接受两种不同的幸福之道:前者选择弃绝世俗(此同样为彼特拉克之弟格拉多所选择),而后者决定继续在俗世安身立命、争取幸福。

卡尔卡特拉对《秘密》的解读更为细密。他辨识出诸如“神若光芒内在”、“凡人必要恩典”等此类概念实为奥古斯丁式的典型主题。卡尔卡特拉进一步认为,奥古斯丁的道德范例为彼特拉克的世界带来危机,甚至使劳拉之爱成为罪恶,于是这意味着深受奥古斯丁作品启发完成的《秘密》,标志着彼特拉克将劳拉之爱理想化的开始。然而,笔者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论点。因为在《秘密》第三章中,作者已清楚地表明对这种奉献式爱情态度的谴责。当弗朗西斯科以普通造物之爱替换上帝之爱遭到训斥时,便说明了热爱任一造物的主要原动力绝非单一的情爱。对劳拉之爱的讨论并非要引导促成一种但丁式的攀升——人性的超越,更甚之,它乃是对人类灵魂最深处进行的全面探索,以之强化自身的信仰和道德意识。如此一来,个体才能自发地获得一种内在救赎的力量,在极大的困境中经历每一天的遭遇,并承受生而为人的长久苦痛。

另外,对于彼特拉克的抑郁心病(*acedia*),如同美国学者西格弗里德·温泽(Sigfried Wenzel)所提醒我们的,绝不能以超历史(*metahistorical*)的方法来阐释。事实上,彼特拉克所指的伤感(*tristitia*)和抑郁心病更接近中世纪修道院的习惯用



语,而非现代概念中的倦怠(*ennui*)或疏离(*alienation*)<sup>①</sup>。而彼特拉克《秘密》中的奥古斯丁亦不是一个真确的历史人物。意大利学者李维(Giulio Levi)的研究认为,一千年前的圣·奥古斯丁并不能在教义及理论上完整地解答《秘密》中提出的问题;德国学者海特曼(Klaus Heitman)也指出彼特拉克偏离了奥古斯丁正统的许多要点。

最后,让我们停留在彼特拉克的奥古斯丁主义上面。当代欧美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已为文艺复兴时期同类经典著作的解读带来新的曙光。卡尔卡特拉就在他关于圣奥古斯丁对但丁和彼特拉克著作的影响的长篇讨论中,强调奥古斯丁的影响不局限于此一著作,而是波及了彼特拉克所有的重要作品。虽然他们皆同意,奥古斯丁主义可以作为开启彼特拉克人格面貌最充分的钥匙之一,但其实它并不被认可为关键之所在。在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中,他将自己从基督教作家们那里所汲取的思想,同古代作家们的观点熔于一炉。因为在《秘密》里,他自身的论述更多的带有古典的、异教的伦理色彩,而较少属于基督教教义或《圣经》的成分。我们可以说,用于净化彼特拉克之心的原动力是出于理性而非宗教。即便是《秘密》中出自奥古斯丁之口的论述,也经常遍布着古典的、非

---

① 西格弗里德·温泽:《懒惰之罪:中世纪思想及文学中的“抑郁心病”》(Sigfried Wenzel, *The Sin of Sloth: "Acedia" in Medieval Thought and Literature*. Chapel Hill, NC: Univ. of NC, 1967)。